

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

1906—1908年 马达汉西域考察 图片集

马达汉(C·G·Mannerheim) 著
王家骥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06—1908年 马达汉西域考察 图片集

马达汉(C·G·Mannerheim) 著
王家骥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06 ~ 1908 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 / 马达汉著; 王家骥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603-454-4

I .1… II ①马…②王… III.中国 - 科学考察 - 1906 ~ 1908

- 摄影集 IV.N8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第 45423 号

书 名 1906 - 1908 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

著 者 马达汉 (C·G·Mannerheim)

译 者 王家骥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 编 室 (0531)2060055 - 5420

市 场 部 (0531)2906847 (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889 × 1194 毫米)

9.75 印张 88 幅图 50 千字

印 数 2001—4000

I S B N 7 - 80603 - 454 - 4 / K · 111

定 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近100年前，一个负有间谍使命的芬兰探险家由新疆入境，途经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河北最后到达北京。这个中文名字叫马达汉的人，沿途写了数十万字的旅行日记，拍摄了1370余幅照片，在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之后，这些日记和照片方得面世，尽现20世纪初叶中国西北的人文风貌。

目 录

1. 序言
3. 译者的话
5. 前言
7. 骑马穿越亚洲
13. 骑马与摄影
17. 马达汉日记节录和图片

序 言

王家骥先生翻译的《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芬兰彼得·塞·赛德伯格主编)中文版即将出版,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家骥先生嘱我写几句,作为一名关注西域考察的研究者,当无推辞的理由。

2000年春天,我有幸结识了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在芬兰留学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家骥先生。我们愉快、融洽地商议了进行20世纪初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西域考察资料整理和研究事项。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西域的考察活动是中国边疆探察史研究中的热点,并日益为普通读者所关注。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西域考察却鲜为人知,在近年编制的几种外国探险家西域考察大事记或编年史中多有遗漏,在相关中文著述中也属被遗忘的角落。我仅见刊发于《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1期,刘爱兰、房建昌《芬兰总统麦耐里姆光绪末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一文。该文也只是对其1906——1908年的考察做了略述性介绍。

马达汉于1906年受沙皇俄国派遣,带着“刺探军情、查明虚实”和考察新疆各民族历史与习俗并搜集古代文物的双重目的,从中亚地区骑马进入我国新疆,又从新疆经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到达北京,行程14000余公里,历时两年之久。其中考察新疆是马达汉中国之行的重点。他利用芬兰贵族男爵和沙皇俄国派遣特使的身分,在清政府地方官员的关照下,从喀什开始,走遍了南疆和北疆,所选择的路线往往偏离传统的“丝绸之路”。他时而沿着边境线翻山越岭,时而溯源逐流,穿越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记录气象水文数据,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每到一处,马达汉还广交各级地方官吏,了解新疆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他还专程拜访一些民族首领和部落头人,特别留意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和民俗民风。

在近代外国探险家的考察中,马达汉的西域考察占有一定的地位。马达汉将沿途调查所得详细写在日记、调查报告和回忆录中,成为今天研究20世纪初新疆的一份宝贵的实录。

我与家骥先生商定并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决定开展马达汉西域考察的资料收集、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拟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予以立项;

第二步，编译《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纪行》，其内容将包括马达汉西域考察的回忆录和日记；

第三步，在进一步整理马达汉考察报告、收藏于芬兰马达汉博物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有关马达汉的资料，以及在吸收国际学术界研究马达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撰写马达汉西域考察的传记专著。

开展19至20世纪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活动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这一领域曾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每当想到这一时期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中损害中国主权、私携文物出境的行径，总有一种民族感情感受到莫大伤害的耻辱感。对这种行径，我们不会忘却，也不应忘却！因此，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诸如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波塔宁、瓦里汉诺夫、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华尔纳、橘超瑞、日野强等人的考察活动，揭露和批判这些人的活动实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争夺势力范围需要的实质；但是，作为研究者还应认识到，外国探险家们尽管每个人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谴责，但应该承认，他们的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我们对他们的研究还很不够，其中也包括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研究。

如果从19世纪算起，新疆考察即将跨入第三个百年——21世纪，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开拓研究，对19至20世纪外国探险家的众多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翻译和评估，当是一项急迫的任务。为此，首先是要整理出翔实的外国探险家的新疆考察的资料目录；其次是分别轻重缓急对其进行翻译和整理；最后是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角度进行总结，并着力于宏观与微观、多学科相结合的专题研究，特别是应从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高度，开展新疆考察史研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作为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察的有机组成，当然是不应被忽视的。

在翻阅家骥先生在芬兰工作期间收集、收藏的多种英文、芬兰文版马达汉回忆录、日记以及其他资料时，一本装璜精致的画册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作为芬兰—乌戈尔学会人文科学丛书于1990年出版的《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该书收选的87幅照片是从马达汉中国之行时所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的。将历史定格于瞬间的老照片的独特魅力，让我痴迷，心灵为之震撼。没有丝毫犹豫，我建议将画集翻译并尽快在中国出版。此议不仅得到家骥先生的响应，并很快完成了译稿，我的老友、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稼明先生得悉此讯不仅友情支持，并破例列入了当年出版计划。同时获得了本书版权所有芬兰—乌戈尔学会和马达汉著作所有权的所属单位马达汉基金会所给予的出版中文版的授权。我还要感谢芬兰驻华大使馆安芬妮小姐对此项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我希望《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中文版的出版能为广大的学者所接受、所喜爱。让广大的中国读者来共享这将历史定格于瞬间所带来的心灵的震撼和视觉的惊讶。

2000年4月12日

于北京自乐斋

译者的话

早在1960年，译者刚到赫尔辛基大学进修不久，就赶上了芬兰一个大型历史性活动。那年6月4日军旗节，芬兰总统吉科宁主持了马达汉元帅骑马雕像揭幕典礼和阅兵式，在国会大厦前方马达汉骑像耸立的地方，旗帜飘扬，人头攒动，场面热闹非凡。然而，此事却在芬兰政界和老百姓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官方立场的右翼舆论欢呼骑像是芬兰独立的象征；左派人士则认为是战争和死亡的标记。左派工会还组织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马达汉是这位具有争议的芬兰元帅（原名 Carl Gustav Mannerheim）的中文译名。一位熟悉芬兰历史的中国外交官告诉我，那是马达汉年轻时作为俄国军官到我国西域考察时新疆的清朝官员给他起的名。

1960年夏天发生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马达汉和芬兰近现代史进入了我的学业。当我有机会读到马达汉的芬兰文版《回忆录》和《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时，我为书中大量的有关晚清时期中国西域社会的纪实性文字和图片感到震惊。我当时想，抛开马达汉的历史功过评述，他对中国考察留下的大量资料不啻是我们研究历史和中外关系的有益参考。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要把马达汉及其中国考察纪行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和研究学界的想法。但光阴似箭，一晃数十年过去了，由于外交工作的繁忙，一直未能如愿。

今春以来，马达汉著作的编译工作终于起步，这完全仰仗于几位朋友的鼎力协助。芬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安芬妮小姐是位促进中芬文化交流的热心人。她一直鼓励我不要放弃编译计划，还把她珍藏的马达汉考察日记芬兰文原版上下两册借给我使用，并提供了与芬兰方面联系的方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佩娟教授是毕生从事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她在翻译出版俄罗斯和西方探险家西域考察文献方面有许多成就。经由佩娟教授的引荐，我有幸结识我国著名的边疆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教授。马教授以高屋建瓴的科学识见对马达汉的西域考察在学术上的定位，赋予了此项工作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意义。

马达汉（Carl Gustav Mannerheim 1867—1951）是芬兰瑞典族人，毕业于俄国著名的圣彼得堡尼古拉耶夫骑

兵学校，当过沙皇宫廷卫队的军官并长期服役于沙俄军队。1904—1905年在我国东北参加过日俄战争。1906—1908年受沙俄总参谋部的派遣赴我国新疆和西北各省考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马达汉返回芬兰，组织白卫军镇压芬兰工人的武装起义，同年芬兰宣布独立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18—1919年马达汉就任国家执政官。1939—1940年芬苏战争和1941—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芬兰三军总司令。1944—1946年任芬兰共和国总统。1951年病逝于瑞士。

马达汉在回忆录中毫不讳言，他的中国之行目的是“刺探军情、查明虚实”，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服务。当时的中国，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侵略深入到各个方面。清廷统治者慈禧太后为博得列强欢心和顺应潮流，开始实行新政，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满清封建官僚统治的腐败状况。1905年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在为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战争中败于日本，其向我国西藏地方的扩张势力也遭到英帝国主义的钳制，这时又企图侵吞我国西北边陲——新疆。马达汉接受的任务就是要探明中国中央政权在边陲的实力影响和满清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且考察“对俄国来说仍很陌生的‘中国土耳其斯坦’和西北边境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此外，马达汉还受芬兰—乌戈尔学会的嘱托，沿途考察新疆各民族历史和习俗并搜集古代文物。

马达汉把沿途所见和调查所得详细地写在日记中，内容包括沿途地形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分布、动植物资源、城市和居民点的位置、历史沿革及交通情况、商业集市、文化教育、军事编制、军营宿地、地方经济、农牧业收成和矿业资源等等。另外对于地方官吏、军队、少数民族、寺院古迹和各种见闻等，也在日记中作了描述。

马达汉日记于1940年由芬兰—乌戈尔学会整理出版。马达汉日记发表后，引起了世界地理学界的重视，瑞典地理学会授予作者赫定金质奖章，表彰他对“交通不便和与世隔绝的地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考察。1951年发表了马达汉《回忆录》，其中游记部分是作者根据日记改写的。《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是由芬兰彼得·赛德伯格先生选编，于1990年作为芬兰—乌戈尔学会人文科学丛书出版的。《图片集》以精选的图片为主，配以相关的马达汉日记节录，具有纪实文献的性质。

最后，在《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中文版作为马达汉西域考察著作系列的首篇，即将完成文字工作之际，我还要感谢边疆中心的同仁们的合作，特别是年轻的蒙古族学者、副研究员阿拉腾奥尔其，他以娴熟的俄、英文和西北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功力，以及史地专业知识对《图片集》的文字作了校核。然而，限于译者水平，难免仍有误译疏漏之处，万望读者批评指正。

2000年4月20日于北京

前言

这本画册的图片是从马达汉1906——1908年在西域考察时拍摄的大量照片中精选出来的。选编图片集的想法是在筹组“芬兰摄影者展示中国”图片展时产生的。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在国家文物局档案里的马达汉图片资料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都具有某种启示作用。图片集展现了一个遥远的，已经消逝了的世界。它是对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过去老百姓生活的生动写照。在“芬兰摄影150年”图片展（维克多·巴索盖维茨摄影中心举办）中被选为展品的10幅图片格外引人注目。毫无疑问，很可能是因为观众对带有历史性和异国情调色彩的图像产生一种新奇的感受。对于马达汉旅行日记来说，这些图片是附带的，并不是为特定的事物而拍摄的，大部分情况是一种副产品。于是就产生了出版图片集的想法，目的在于使图片以自己应有的魅力展现给人们。在实施过程中，图片集的主创人尤卡·库科宁极尽了辛劳，而哈里·海伦的专业性制作则是不可替代的。

现在这本画册共收集了87幅照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尽管这些图片是按年代的先后程序编排的（也有个别例外），但画册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按马达汉亚洲之行日程表编排的。它也不是一部旅行记录片，只是一种图片选编，选择的标准主要是从美学观点考虑的。久远的年代也是因素之一：马达汉沿途冲洗他的照片经常是在一种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岁月的消逝，相当一部分硝酸银负片已经衰退。某些最佳的旅途风光由于找不到保存良好的底片，在画册里未能显示出来。

至于文字方面，哈里·海伦撰写了一篇马达汉西域考察及其成就的简介在前；尤卡·库科宁从摄影师角度评述马达汉的野外考察在后。所有的图片说明主要是出自马达汉自己的解释，另外每幅图片配一段相关的马达汉考察日记节录，尽管不可能是对相关图片的直接说明。图片说明是由哈里·海伦节选的。所谓节录，不是摘引已发表的版本（马达汉日记），而是根据原来的版本加以对照整理，必要时作一定修改的日记片断。此外，埃迈里克·奥索尼的芬兰文译本和爱德华·比尔瑟的英文译本（马达汉是芬兰瑞典族人，他的考察日记原文是瑞典文——译注）都有一些曲解原义的错误，在这里都得到了纠正。诠释地名和各种外来词语往往产生无穷无尽的问题。这里的中文，我们采用了现代标准的拼音文字。我们的宗旨始终是为了清晰和保持连贯性。节录文字

中的删节部分没有显示出来，但这些节录的日记片断或多或少都是与原版日记相关联的。

骑马穿越亚洲

马达汉受俄国总参谋部的派遣，于1906—1908年进行了骑马穿越亚洲的旅行。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特殊使命，是俄罗斯派出众多军官对中国进行一系列地理和军事探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其他军官的探测活动有1802—1803年的乔治·马格努斯·斯潘博顿（Georg Magnus Sprengtporten），1805—1807年的米哈伊尔·别甫乔夫（Mikhail Pevtsov），1879—1895年的尼古拉·普尔热瓦斯基（Nikolai Przhevalskii）和1899年的彼得·科兹洛夫（Piotr Kozlov）。

1904年，马达汉在婚姻破裂之后不久，即作为志愿者，远赴满洲前线，抗击日本人。1906年春，他意外地受到了俄国总参谋长帕里琴（Palitsin）将军的召见，计划派他参加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从突厥斯坦（指中亚地区——译注）到北京的远征队活动。马达汉的任务是去搜集中国边疆省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此行显然是出自沙皇的旨意，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挑选了马达汉去执行这项任务，至今还是个谜。他甚至在接受派遣时还曾经犹豫过。他觉得很有必要为他自己的小小远征队配备一些行装，因为伯希和是一个持敌视态度和反复无常的人，若不接受其非分和屈辱的强制条件，他是不肯同意一名俄罗斯上校作为他的旅伴的。不过，不管怎么讲，他们在旅途的开始阶段从安集延（Andizhan 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译注）到喀什噶尔还是走到了一起。

这种旅行对体力和智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毫无疑问具有纯粹冒险的一面。在满洲战争（1905年日俄辽东半岛之战——译注）快结束的时候，据说马达汉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即想骑马穿越蒙古。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跟他同期的一些俄国军官和其他旅行家时常因在这个地区行走并获得一些发现而名声大噪。不少人认为，诺登舍尔德（A·E·Norden Skiold 瑞典探险家、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1878—1889年曾从挪威穿过北冰洋亚洲部分航行到太平洋，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东北航路的航行——译注）对东北航道进行的令人兴奋和具有英雄业绩的探险航行赋予了马达汉某种相对浪漫主义的动机。尽管他想成为一名探险者而名扬四方的愿望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一闪之念，但却增加了他接受探险任务的动因。

总参谋部指令马达汉在沿着中国西北和北部边疆的远征途中搜集军事统计资料，整个行程包括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和山西等省，还有内蒙古。马达汉必须自行估测这个国家的国防能力，包括军队编制和军事训练，核实有关省份的人口调查统计数字，评估行政改革的进展情况和探测少数民族追求自治的欲望以及十三世达赖在喇嘛教地区的影响。他还受命调查老百姓如何看待政府的对俄和对日政策。俄罗斯在战败受屈之后，非常关注日本对中国政府的

新政产生多大的影响。从战略目的考虑，马达汉还必须勘察通向喀什噶尔和经过兰州到北京的线路，以便找到一条最佳途径，把骑兵和拥有各种装备的独立军团送往兰州。这些都是他的一般目标。他还有一些特殊任务，包括测绘喀什噶尔—乌什—托什干河线路，确保托什干河从高山源头到与叶尔羌河的汇流区都是适宜的防御线。再有就是搜集阿克苏绿洲的军事情报，勘察通过木扎尔特山口（Muzart 位于新疆西部温宿县境内——译注）到固尔扎（Kuldja 今伊宁市——译注）和珠勒都斯河谷的线路，最后是评估兰州是否适宜作为军事基地。

1909年，马达汉的战略性考察报告作为俄罗斯学术论文系列发表在圣彼得堡《亚洲统计、地理和地貌》杂志上。尽管文章标题说明仅仅是初步报告，但最后的总结报告始终没有发表。其他方面也一样，马达汉的考察对总参谋部来说真正的价值何在，一直是模糊不清的。马达汉在满洲前线的前上司库罗帕特金（A·N·Kuropatkin）将军在他1913年出版的论俄中关系问题著作中，尽管就这个地区提出了相关的前瞻性军事战略观点，但却根本没有提及马达汉新的、详细的情报。毫无疑问，这位芬兰裔骑兵上校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至于考察成果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不是他的错误。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不久爆发，战争打乱了所有既定计划，俄国被卷入了另一场更加紧迫和充满灾难的大战乱。

从马达汉肩负的次要任务来看，其历时两年的骑马旅行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更多是增长知识的探险考察。为了掩护刺探军情的性质，多种纯科学性任务是由马达汉的祖国托付给他的。他将要跨越的区域，在任何情况下都富有考古和民族学的意义，这不言而喻地就赋予他一个考察者的身份。日本人在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已经渗透到中亚，并派出间谍窥视中俄的动向。英国人则从印度成功地从事他们富有成效的特务活动。鉴此，中国当局试图控制每一个外来的旅客，并对他们持怀疑态度。那时司空见惯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和地理考察队，所以考察者的身份就成了军事间谍的理想庇护。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马达汉对其行程谈不上进行了科学性计划，因为当时最有名的俄国中亚探险者、科兹洛夫上校并不想给自己的同事出什么主意。马达汉以特有的小心谨慎态度为他的新的冒险事业作准备。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过去的探险资料并且发现他正处在一场争夺新发掘的中亚文物的国际竞赛之中。通过参议员奥托·唐纳（Otto Donner）的帮助，他开始与芬兰—乌戈尔学会和安特代表团（Antell Valtuuskunta）谈判——后者代表了未来芬兰国家博物馆的利益。

最后，期待他的任务很多：除了勘察和测绘工作外，他还须采购考古和民族学文物和古代书简或文书残片，拓印碑文，进行人体测量和拍摄用于比较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人种形态，收集有关鲜为人知的北部中国人语言和人种学的资料，等等。准备时间太短了，什么都要学习是不行的。马达汉说，他之所以能够为科学做点事情，这要归功于一两本英文的探险者手册。事实上，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收集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部出版。马达汉在芬兰逗留期间，兰司铁（G·J·Ramstedt）提供了不少有关旅程的实际意见。兰司铁在前一年曾访问过准噶尔盆地（Dzungarian）的游牧部落，而马达汉的考察路线将通过珠勒都斯河谷并进入同一区域。马达汉准备把兰司铁的一封信带给他的朋友，当地的土尔扈特部汗王巴雅尔王爷（Bayar Wang）。

马达汉经过撒马尔罕、塔什干、安集延（Andizhan）和奥希（Osh）抵达中国境内的喀什噶尔。1906年秋，他从那里出发，沿着赤日炎炎和尘土飞扬的丝绸之路南段到和阗（Khotan）然后返回，作为旅行的预演。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曾是他长期向往的地方。他在附近山里进行了游猎，收获不小。在他的情报工作中有一项任务是侦察核实，在那个地区是否像谣传的那样有日本人在活动。

发烧和时而风湿病复发使旅程艰难无比。在和阗（Khotan）的英国代理人巴德鲁丁汗（Badruddin Khan）的帮助下，马达汉购买了一些文物，都是当地人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其中有一些新的描述伊斯兰教圣祖传记故事的书简手迹。这个绿洲城市与她的古代名声很不相称，至少就传统的欢乐气氛来说似乎少了点，欧裔居民看起来好像感染上了抑郁症。当地的瑞典传教士给了他很多实际的帮助，马达汉与他们呆在一起，进行研究和休整，与此同时为他的真正远征——向丝绸之路北段出发准备行装。

1907年1月底，马达汉离开喀什噶尔，朝着东北方向固尔扎和伊犁谷地前进。他在柯坪（Kelpin）试着进行一些考古挖掘，但结果没有什么意义。在阿克苏，他首次获得机会向一些相当友善的中国官员探询该国的行政和军事改革情况。他在那里呆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因为他的蹩脚而呆板的翻译以及必要的测绘工作延误了一些时辰。他们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在狂风中穿越冰冻艰险的木扎尔特山口。然后，他抵达了位于广阔的特克斯（Tekes）河谷的卡尔梅克人区域（Kalmuk 是西方一些著作根据穆斯林史料对居住在高加索和新疆北部的蒙古卫拉特人的称呼——译注）。他在那里进行了多次颇有收获的狩猎活动，一路上巍峨峻峭的阿尔卑斯山式的景观和多种多样的体育竞赛令他心旷神怡。

固尔扎是一个驻兵的边防城镇，紧靠俄国边境。那里的居民分属十多个不同民族，政治上按利益划分为亲俄和亲华两大派。在俄国总领馆一等秘书兼业余考古学者迪亚可夫（A·A·Diakov）的陪同下，马达汉考察了附近的古代墓碑并进行了一些小小的发掘工作。

他发现在六苏木（Zurgaan-Sumu）的土尔扈特部人（土尔扈特为额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地区。1627-1628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带领部众五万余帐，离开塔尔巴哈台地区，到额济勒河，即今伏尔加河下游的荒莽草原上建立新的家园。后来，俄罗斯兴起后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和压迫。1771年，为摆脱俄国控制，土尔扈特部十六万九千余众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离开额济勒河，踏上重返祖国的路途。他们一路上冲破俄国军队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难险阻，最终仅以半数进入伊犁。为褒奖土尔扈特部归国壮举，清政府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即英勇之汗，并把渥巴锡所部编设札萨克旗制，共十旗。渥巴锡领四旗。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移牧于喀喇沙尔以北的珠勒都斯河一带。——译注）中还盛行着卡尔梅克人的帐篷生活。他让土著头领下令要他的族人洗澡，并成功地对他们进行了人体测量。

1907年7月，马达汉从白雪皑皑的天山山麓下来，回到丝绸之路。他在靠近喀喇沙尔（Karashahr）绿洲的一片废墟中发掘到了一些陶罐碎片。从这里开始了他遍游北疆的旅程，目的地是向北方的乌鲁木齐进发，它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也是全新疆的行政中心。他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获得了有关民情和军事训练的尽可能详细的情报。为了回到丝绸之路，就必须再次翻越天山。前方就是吐鲁番。这是中亚最低洼的腹地，自远古时期就有人居住并进行了开发，那里有大量古城废墟和石窟。然而，鉴于考古挖掘者对文物已经造成了严重破坏，马达汉决定不去碰任何东西。他仅仅从当地居民那里买了一些从沙漠里发掘出的文物和具有千年历史的带皱褶的书筒残片。到了巴里坤（Barkol）湖，马达汉有机会观察到那场造成灾难的回民（Dungan）叛乱的痕迹。

在一个寒冷的秋天，马达汉第六次翻越天山之后，向哈密行进，并沿着戈壁沙滩的边缘进入中国的甘肃省界。道路前方展现了一条长达一千公里的丝绸之路，人称河西走廊。马达汉从安西出发向西南行，抵达举世闻名的敦煌绿洲，古代的莫高窟佛崖就坐落在附近，那里有新近发现的文书宝藏。

1907年，马达汉到达一个被称作黄裕固族人的地区，一个信奉喇嘛教的少数民族群体。最初他遇到的是突厥语族的撒里（Saryg）裕固，后来在康隆寺（Kanglongsi）又遇到蒙古语族的西拉（Shira）

裕固。他与西拉裕固人相处极好，最后离开时感到难舍难分。1911年，他在赫尔辛基发表了一篇关于与鲜为人知的这两部族人交往的论文。

在甘肃省会兰州，马达汉遇见了好些比利时传教士。他们在甘肃（今张掖）和凉州（今武威）早已相识。马达汉传染上了流感，发高烧，一个月没有写日记。痊愈后，他在日记中花了很多笔墨对兰州作了大量描述。比利时神甫向他提供了许多观感和实情以及一些有价值的收藏品。

离开兰州后，他继续穿行于甘肃和青海两省的中国穆斯林或称东乡回和藏族或称吐蕃的领域。那里的居民要不是冷漠怕生就是凶暴好斗，而且还多处碰到拦路抢劫的职业强人。藏族大喇嘛寺拉卜楞寺里的和尚和香客对外国人公开地怀有敌意。然而，马达汉还是得以参观了寺庙并且购买了一些喇嘛教的宗教法器。

1908年春季，马达汉游览了古都西安的清真寺、道教圣地华山和闻名遐迩的龙门石窟。那里同样笼罩着敌视气氛。最后，终于到了铁路的最西端开封。马匹与武器大部分在那里都给卖了。仲夏前后，马达汉抵达佛教圣地五台山，在那里碰巧遇上了避难在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位精神领袖对来自俄国沙皇的任何信息都颇感兴趣，因为西藏正在遭受英军入侵的劫难。马达汉离开五台山，绕道长城外，进入现在所称的内蒙古——此前不久有一位芬兰探险家到过同一地区，马达汉是第二个。1908年7、8月份，马达汉经过张家口（Kalgan）顺利到达北京，他在俄国使馆呆了一个月，起草他给总参谋部的报告和整理他那包罗万象的资料。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马达汉行程14000公里，陪伴他的仅仅是一小队哥萨克随从和一个任性的翻译。他的小小的车队时而沿着用斧头在冰面上砍出的台阶向高山爬行，时而在炽热的沙漠里呼吸着焦灼的空气，时而在青翠葱郁的绿洲恢复生机。在沙漠深处的古城废墟，沉寂了千年之久的古瞭望台闪烁着微光，似乎在倾诉着很久以前那个时候丝绸之路上车辚马萧萧的繁忙景象。马达汉在马背上测绘了长达3,087公里的线路图，绘制了将近20个中国驻兵的要塞草图。

马达汉在日记中翔实而全面地描述了充满艰辛险阻的旅程。这部日记一直被搁置到1940年才由芬兰—乌戈尔学会翻译成英文出版。原意是在1937年为庆祝作者七十大寿而出版，结果却成为对当时正在指挥抗苏战争的总司令崇高形象的一部嘉奖作品，尽管从整体上说它是一个非常局限的版本。这部作品的第二册辑录了芬兰和外国学者在马达汉购买的收藏品基础上撰写的论文和由芬兰专家加工绘制的清清楚楚的线路图。马达汉在途中拍摄了1370幅图片，

但只挑选了其中307幅在书中作为插图发表，大部分图片没有得到利用。现在这部可称为详细的图片日记则增加了这些图片的价值。

在军事情报方面，马达汉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可以问心无愧地感到满意。由于此项任务的秘密性质，附在给总参谋部的报告后面的线路图和补充资料没有公布，只印制了一张全图。马达汉作为业余爱好者，似乎过低估计了自己的野外科学考察和收藏品的意义，然而它们的真正价值却越来越变得明显。

对于2000件左右的书简残片的研究最近才刚刚起步。这些文物是从吐鲁番的干沙漠里发掘出来的，它丰富了世界各地科研中心的收藏品。除此之外，从兰州获得的一套罕见的水墨人物画，包括420位天神和被神化了的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在拉卜楞得到的藏传喇嘛教祈福用的唐卡画(Thangkas)和大量的其他有趣的物品都没有公布过。这些收藏品大部分保存在芬兰国家博物馆，其它部分由芬兰-乌戈尔学会档案室和马达汉博物馆保管。还有一些散失在私人手中，那是马达汉售出的，而安特尔代表团曾对此提过不同意见。他把中文印刷的一本名叫《回回渊源》的小册子捐献给了赫尔辛基大学，这是一本描写东乡回族历史的书籍。1905年兰司铁曾从俄国驻塔城领事馆获得一本稀有的相同内容的手抄本。

马达汉的中亚考察活动在各方面都是值得称赞的，他的名字可以与一些伟大的中亚探险家并列。甚至苏联最终也承认了他的成就。克里亚什扎尔内和科列希可夫在他们合著的名为《俄国旅行家眼中的新疆》(Vostochnyi Turkestan Glazami Russkikh Puteshestvennikov Alma Ata 1988)一书中简要地叙述了马达汉的成就。当然，这两位作者是吝于使用“最伟大的事业”(Magnum opus)这个词的。